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

JINDAI MINZHONG JIAOYU GUAN YANJIU

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

周慧梅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



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

周慧梅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

周慧梅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周慧梅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2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ISBN 978-7-303-13707-7

I. ①近… II. ①周… III. ①国民教育-文化馆-研究-南京市-近代 IV. ①G527. 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0862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邮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刷:
装 订: 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 mm×230 mm
印 张: 23
字 数: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策划编辑: 刘东明	责任编辑: 刘东明 刘松弢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毛 佳
责任校对: 李 函	责任印制: 李 丽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序

中国历来有重视社会教育(习惯上称之为社会教化)的传统,然而长期以来,社会教育却较少进入中国教育史研究者的视野,更少有成果面世。尽管教育理论体系越来越庞大和复杂,而值得关注的社会教育的研究却是备受冷落、冷冷清清,研究的成果少得可怜,研究的人员不多,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没有一本较权威的社会教育学专著,没有一本较系统的中国社会教育史论著,大学的教育研究机构和相关系科也甚少有开设社会教育史课程。这种状况,无论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还是从现实需要的角度来看,都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研究社会教育史,对于教育史学科来说,可以丰富和深化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补充教育史学科的内容,拓宽教育史专业的研究领域。

对社会教育史的系统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和国钧同志组织力量做《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时曾有过一些尝试,编写组对中国教育制度史研究内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把社会教育和教育政令、学校教育制度等一系列为主要研究内容,各分卷主编做了一些可贵探索,但明显还不够。2004年,集北师大中国教育史研究团队之力,我“聊发少年狂”,主持了211重点课题“中国社会教育通史”,希望能对社会教育做进一步系统、详细的工作。我的几个学生也参与了这项研究工作,周慧梅的博士论文《南京国民

政府时期的民众教育》便是社会教育通史(民国卷)的组成部分。她毕业后进入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在合作导师何兹全先生的支持下,选择了民众教育运动的综合机关——民众教育馆进行了专题研究。这本专著便是她在博士后出站报告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实际上,我时常在想,社会教育史之所以踟躇趑趄,资料的芜杂枝蔓、学科划分辖限、意识形态禁锢等固然是原因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该研究哪些内容,用什么标准取舍,从什么角度介入,用什么方式研究等问题长期含混不清。特别是近代以来的社会教育,不仅历经传统社会教化向近代西方意义上“社会教育”的转化,还承担着“教育改造和社会改造”的双重任务,通俗教育、平民教育、民众教育……从辛亥革命到抗战全面爆发不足30年的时段内,社会教育的主体表现形式不断变化,或一枝独秀,或交织缠绕;而施教内容从文字教育、政治教育、生计教育到健康教育、休闲教育、科学教育,无所不包,不一而足,让人眼花缭乱。

辛亥革命以来,随着西方影响范围逐渐渗入中国广大的内陆城乡,与其他后起国家的近代化历史一样,中国社会精英更加明显地分化为近代化的倡导者和传统文明的守护者两大阵营,在社会文化和社会政治领域,双方展开了一次又一次激烈的冲突和较量,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基础尚未基本改变的现实,双方冲突和较量的结果,有势不两立,也有彼此妥协和融合。新与旧,革新与传统,进步与落后,舶来品与本土化……往往复杂纠葛在一起,难以厘清此疆彼界。它们对教育领域的影响,在社会教育领域(社会教育始终徘徊在学制体系之外,加上社会教育司职掌范围的宽泛性等)更为淋漓尽致。凡此种种,都增加了研究社会教育的难度。

大体来讲,近代社会教育史研究,我认为应有两大领域:一是社会教育理论,二是社会教育实践,包括社会教育的行政、社会教育的机构以及社会教育实验等。周慧梅博士的新作《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就是从机构设置这一角度入手,对近代以民众教育为主要形式的社会教育进行深入研究的一项成果。

近代社会教育设施之中,民众教育馆的地位极为重要。它前接北洋政府时期的通俗教育馆,后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馆、图书馆,繁盛时期

曾推广至全国各地。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公布了《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将它作为实施民众教育的综合性的中心机关，用“行政力”铺设了民众教育运动发展的路径，同时赋予了民众教育馆权威性资源地位。国民政府专门彰显了民众教育馆的设置目的：“从民众生活之迫切需要出发，积极充实其生活力，从而培养其组织力，并发扬整个民族的自信力，以达到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之教育宗旨”，可见民众教育馆的设置是与当时“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相适应的。而从实践层面来说，作为社会教育的中心机关，民众教育馆所开展的活动几乎囊括了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如为失学民众提供补习教育、指导家事改善与民众健康教育、协助保甲制度与地方自治的推进、乃至壮丁训练；进行各种职业指导与介绍、农作物土质试验、优良品种的推荐、病虫害的预防、各种工艺的讲习、商业补习教育、合作社的组织与改良等。从民众教育馆这个“点”来深入挖潜民众教育运动，具有代表性。

民众教育馆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一书的重点并不在于民众教育馆的各项事业上，而是在掌握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近代民众教育馆的发展历程、内部管理、社会功能与文化性格等问题，指出民众教育馆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特定产物，且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在国民政府时期，民众教育馆成为政府对乡村生活进行干预的一个主要载体，是社会精英们以教育改造社会的一个典范，其活动既体现出国家、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又反映出新的乡村社会力量与旧乡绅权贵在基层社会中权力争夺，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度，从更高的层面上将民众教育馆的设置动机、内部管理与实际效果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逻辑体系。周慧梅前期的博士论文对整个民众教育运动已作了全景考察，以此为铺垫来深入研究民众教育馆，基础还是比较扎实。在资料运用上，她充分利用了搜集的大量民国档案、民众教育馆自办刊物、相关著作，还有数百幅老照片，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花了大力气查阅了大量文史资料，利用当事人的“口述”与文本资料相互印证，增加了说服力，老照片的印证也独具匠心。总之，该书在史料挖掘上是有突破的，在观点分析上也有诸

多创新。

周慧梅是跟随我多年的学生，长期担任我的助教。博士后期间算是我协助何先生指导的，她这些年来的勤奋和努力我是十分清楚的，而对于她每一点的进步我都感到十分欣慰，本书的出版也算是对她多年来努力的一种鼓励吧。作为导师，我更有责任写一点文字进行勉励，一方面是肯定成绩，另一方面更是希望，希望她能以此作为学术研究的起点，成为中国教育史研究队伍中的新生力量。

是为序。

北京师范大学 王炳照
2009年5月于英东楼417

目 录

绪 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学术史回顾	5
三、本书框架和思路	14
四、资料分析	17
第一章 民众教育馆的兴盛背景	20
一、“北伐战争”时期民众动员方式的转向	20
二、以教育变革社会的理念开始盛行	23
三、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与政府选择	30
四、民众教育馆权威性资源的获得	36
第二章 民众教育馆的历史演进	47
一、民众教育馆的界定	47
二、民众教育馆发展的阶段性	51
三、非国统区的民众教育馆发展	76
四、民众教育馆的地域差异性	87
第三章 民众教育馆的内部管理	105
一、经费来源与分配支出	105
二、组织设立与人员编制	124

三、人员资格与薪俸待遇	141
四、人员遴选与年功考核	174
第四章 民众教育馆的社会功能与文化性格	196
一、社会变迁中的乡村社会	196
二、民众教育馆的社会功能	204
三、民众教育馆的文化性格	246
四、民众教育馆的价值取向	266
第五章 民众教育馆的历史分析	281
一、民众教育馆与乡村社会组织的互动	281
二、民众教育馆与传统社会文化的传承	288
三、民众教育馆与现代化知识体系引介	297
四、民众教育馆与新农村建设组织构建	309
结 语	312
图表目录	314
主要参考文献和征引书目	318
附录 重要法令	327
附录一 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节选)	327
附录二 民众教育馆规程	329
附录三 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馆普及民众教育标准工作实施 方案	334
附录四 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馆组织规程(选录)	340
附录五 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阅览书报规约	341
附录六 成都市立民众教育馆职员服务规程	342
附录七 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师范学校及民众教育馆辅导 中等以下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办法	343
附录八 民众教育馆工作大纲	345
附录九 民众教育馆辅导各地社会教育办法大纲	350
后 记	352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

晚清以降，作为整个中国现代化工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以制度为核心的近代教育体系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问题，而是基于解决近代中国社会问题的需要建立和发展的。伴随屡战屡败的军事失利，“西强中弱”的态势从器具、技术层面慢慢向文化层面渗透，“泱泱中华”国民心态日渐变化，特别是甲午之役，天朝大国竟被“弹丸小国”日本击败，国人所受的精神创伤远远大于军事上的惨痛，“有甲午一役……国人对于本国武力之信念乃完全打破”。^① 痛定思痛，国人的“自我检讨”最终焦点集中到国家和国民素质层面，教育改革已经上升到国家存亡的政治高度。

“学堂最为新政大端”^②，鉴于文盲众多而学堂难以普及，清政府“于立宪九年预备单内，奏设简易识字学塾，欲以辅小学教育之不及”。^③ 清末新政时期，造人才（废科举、兴学堂）、造国家和造社会（以预备立宪、地方自治和社会教育为主体）同时起步。“以癸卯学制为代表的现代学校体系，主要是一种作为科举制度替代物的现代精英（或人才）培养制度；而以简易识字学塾和通俗讲演等形式出现的社会教育，则代表了造就与立

^① 余家菊：《民族主义的教育》，见余家菊、李璜主编：《国家主义的教育》，4页，上海，中华书局，1934。

^② 《袁世凯等奏请废科举折》，见沈桐生辑：《光绪政要》，第27册，卷31，57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

^③ 《学部奏遵拟简易识字学塾章程折》，见《大清教育新法令》，第3册，29页，商务印书馆，1910年铅印本。

宪政体、发展近代工商业相适应的现代国民之努力”。^①可以说，近代社会教育从诞生之日起，自然承担起社会改造的任务。

民国成立后，蔡元培力排众议，在教育部官制中增设社会教育司，与普通教育、专门教育三司并立，在国家教育行政组织上确立了社会教育的独立地位，职掌宗教礼俗、科学美术和通俗教育。1914年7月，通俗教育和讲演会、感化、通俗礼仪、文艺、美术馆与展览会、动植物园、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公共体育场等事业被划归到社会教育司的管辖范围，意欲借此改良社会、提升全体国民的“现代意识”。1922年学制改革，平民化、社会化色彩增加，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的“此疆彼界”开始模糊，平民学校所授“千字课”立竿见影的功效，的确让世人感觉到社会教育的“魅力”所在。随着对“新教育”制度的反思加深，人们认为，经过近30年的教育改革，教育依然为少数人的专利品，文盲充斥、文化落后，大多数民众被摒弃在教育之外，难以承担起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我们所需要的教育制度，是不知有贫富贵贱之分；我们所需要的教育内容，是不知有劳心劳力阶级之分”。^②梁漱溟从分析清末新式办学入手，认为造成民国时期“不嫌人才少，反苦人才多。不但军界人才多，法政人才多，即农业工业人才亦摆起来，没有用。始恍然几个专门人才决救不得国，必待一般民众觉悟而且进步，整个社会才得好。于是民众教育之呼声大起”^③；“今之学校教育，一传统教育也；今之社会教育，一新兴教育运动也。正唯传统学校教育有所不足，或且日益形见其缺短，乃有今之所谓社会教育（或民众教育或成人教育）补救”^④。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教育被作为改造“现代学校制度”的利器，承担起教育改造的重任。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以民众教育为主要形式的社会教育获得大的发

^① 于述胜：《民国时期社会教育问题论纲——以制度变迁为中心的多维分析》，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

^② 新生：《教育革命声中的两原则》，载《生活周刊》，1929，5（43）。

^③ 梁漱溟：《乡村建设和社会教育》，见马秋帆编：《梁漱溟教育论著选》，7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④ 梁漱溟：《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载《教育与民众》，1933，5（3）。

展空间，民众教育承担了教育改造和社会改造的双重使命。“原来民众教育，倘若依我们所怀抱的见解和愿力推阐，应于较早或较迟造成一种强大的教育运动；随之，更进一步，以与其他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力量会合，同起作用，而造成一种进步的社会运动。……综括言之，努力谋现代教育的改造，及相助建设未来新社会秩序，就是民众教育所负的使命”。^① 自此以来，在中国现代教育变迁的背景下，社会教育的发展、衍变以及与其他政治、经济改革（如合作社运动、新生活运动、保甲制度、新县制改革以及抗战动员等）的分立、互动和融合，构成了理解中国社会（囊括城市和乡村）近代化的重要维度。可以说，不理解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不能在社会教育和其他政治、经济改革联系中分析中国教育现代化问题，便无从全面把握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特质。

然而，社会教育涉及面甚广，囊括了文化、经济、政治、民俗、休闲、科学等有关内容，雷沛鸿曾将其内容归纳为十类，纷繁复杂，实施途径众多，既有学校式的集中授课（如民众学校），又有传统社会教化和西方社会教育的方法的综合运用（如戏剧、说书、讲演、电影等）。所以选定一个特定且富有代表性，同时又能揭示现代教育改革发展特质的“点”作为突破口，进行细化、量化分析是必要的，在这种思路下，民众教育馆进入笔者的研究视野。

民众教育馆作为社会教育的中心机关，所开展的活动几乎囊括了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从实践层面上讲，民众教育馆作为国民政府对乡村生活进行干预的一个主要载体，它所开展的活动、价值取向及围绕这些活动所展开的讨论、社会评价等，既体现出国家、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又反映出新的乡村社会力量与旧乡绅权贵在基层社会中的权力争夺，更能外化出“弱势群体”——民众在国家政权向下层渗透过程中的获益情况以及种种心态。围绕民众教育馆开展的主要事业、活动、人员以及内部运行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比较集中地反映出国民政府所寻求的“现代性制度”在近代社会中所作的探索和产生的绩效，便于认识当时社会中各阶层利益关系

^① 雷宾南：《民众教育的自觉运动》，载《教育与民众》，1931，3（1）。

的变化，以及其对农家生产经营模式、耕作方式、借贷方式，特别是基层民众的价值观念、民风民俗、生活方式等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此种制度在基层乡土社会的效果。这正是本书选择民众教育馆作为专题研究的最大历史依据。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曾在《如何研究社会史》一文中指出：“要研究社会史，应该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着手。历史传统本是以往社会的记录，当前社会则是此下历史的张本。”近些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及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的农村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较解放前农村有了很大改观，但多年来“多元异质发展”的历史惯性拉大了城乡差距，暴露出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农民负担过重、辍学率上升、人才单向流动、文化生活贫乏、农业生产后劲乏力、农民甚至整个社会对土地投入缺少兴趣，农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整个社会现代化的“瓶颈”，制约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启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为目标，发动了一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以及民风民俗等多方面改革的新农村运动。^①但就采取何种组织机关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依托机构，产生了很多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温铁军、曹锦清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应该是农民自身，政府的行政力量和其他组织力量只能起到促进和辅导作用，主张以农民合作、“农协”“农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组织依托；一是以贺雪峰、郁建兴为代表，主张新农村建设必须以强劲的乡镇基层政府为组织依托。^②实际上，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民众认同并逐渐掌握新的现代化经济、政治和文化技能，而诸技能的全面导入和扩散对于各种单设机关而言是力所不及的，仅靠农民自身组织或政府力量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新农村建设需要政府与农民相互联系、设置综合性组织机构来承担，民众教育馆这个极为相似的“历史存在”散发着时代的光芒。对当下社会

^① 林毅夫：《呼唤一场新农村运动》，载《领导决策信息》，1999（33）。

^② 郭杰忠、黎康：《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研究综述》，载《江西社会科学》，2006（6）。

主义新农村建设依托组织问题的思考，是本书选择民众教育馆作为专题研究的现实基础。

二、学术史回顾

从学术史发展轨迹来看，关于民众教育的研究有明显的阶段性，呈现出“正弦曲线”的分布态势。从时段上讲，1950年为分水岭，之前为第一个“正弦曲线”，20世纪30年代为峰点；1950年后至20世纪90年代，处于沉寂或谷底阶段；近些年，逐渐开始向上攀升。

1949年前，国内为数不少的学者已对民众教育馆作了大量研究，成果包括著作、论文、报告等多种形式。

著作包括专题研究和相关研究两种。专题研究著作中较有影响的有：宗秉新的《江苏的民众教育馆》（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1933）、林宗礼著《民众教育馆实施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彭大铨著《民众教育馆》（重庆，正中书局初版，1941；上海，正中书局，1947）。宗秉新^①的著作是区域专题研究。江苏省是民众教育馆最为发达的省份。宗氏作为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主任干事，曾对本省各县61馆各种事业、组织建设、人员任职情况等问题作过详细调查，为该书的形成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该书因成书早、资料翔实、可信，成为了解当时江苏省民众教育馆发展的权威资料。林宗礼^②的著作属于师范丛书，是师范生研习民众教育馆的专业基础用书，成书于民众教育馆发展的黄金时期1936年。林氏多年从事民众教育实践和理论工作，对于民众教育馆的主要研究状况耳熟能详。全书厚达348页，分17章，对民众教育馆的区制、馆舍、设备、组织、人

^① 宗秉新，生卒年不详，江苏人，曾任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主任干事、馆长。

^② 林宗礼，江苏人，曾任江苏丹阳农民教育馆馆长，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研究试验部干事，河北省立民众教育试验学校实验部主任；担任河北省教育厅第三科科长，主管该省社会教育行政；河北省现任社会教育人员训练班训练委员，并主讲民众教育馆实施课程；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师，民众教育著名刊物《教育与民众》编辑，教育部社会教育巡讲团成员等。主要代表作有《民众教育馆实施法》。

员、经费、活动、开放和休假时间、效率测量等作了详细论述，并提出将民众教育馆打造成“地方教育的中心、民众精神生活的中心、社会建设的中心”。国民党元老邹永建题写书名，教育界知名人士李蒸、庄泽宣分别为之作序，对此书称赞有加：“林君宗礼本其多年对于民众教育之研究与经验，著有《民众教育馆实施法》一书，内容切于实际，诚为主持民众教育馆诸同志之优良参考资料。”^①或许林氏年少得志，“激情大于考证”，文中流露出急于构建自己理论的情绪，导致书中一些结论比较随意、缺乏严密性，难免给人一种盛气凌人、深度不足的感觉。彭大铨^②的著作属于社会教育辅导丛书系列，确切地说是一本供一般社会教育工作者使用的实用手册，成书于1941年。他作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员，此书是配合教育部颁布的《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办法》和《发动全国知识分子办理民众教育暂行办法》需要，对没有社会教育知识储备的人施以提纲性的民众教育馆知识普及教育。尽管此书仅有155页，又因战事关系，不少省份资料暂付阙如，但因成书于战火纷飞中，难能可贵，“本书印行后，社教工作人员均得人手一册，对其自身所负之责任及所办之事项应采之方法与步骤，不难获有明确之认识”。该书成为战时及战后社会教育司培训社会教育人员的必备书籍。

除此之外，几乎民众教育、社会教育的著作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民众教育馆研究。除去古棣、顾岳中少数几人之外，其他著作成书时间都集中在1937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集中反映的是民众教育馆从创设到繁荣的变迁过程、组织建设、事业开展及出现的问题、既有应对举措等内容。这些以“民众教育”为宏观研究的著作，大多属于不同丛书系列，由于使用对象、成书时间和作者着眼点的差异，对民众教育馆的论述也详略不一。

① 林宗礼：《民众教育馆实施法》，序言，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② 彭大铨，生卒年不详，曾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第三科科长，代表作有《民众教育馆》等。